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冷战与马来亚左翼 (反) 国语运动

Cold War and (Anti)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by
Malayan Chinese Leftists

吴小保
(GOH Siew Poh)

摘要

本文探讨冷战背景下有关马来语文的语言运动, 它的起源是马来语文在19世纪末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下引起的一个长时段语言运动。本文将指出四点, 首先马来语文现代化乃由多个不同背景的群体参与, 过程中或有张力或有粘合, 这包括了华人、马来人、国家、社会、资本等等。其次, 本文分析国际冷战对国语运动的影响, 对左翼运动而言, 国语运动是一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抗争的一部分。由于他们当中许多人被打压成为政治犯, 这种抗争延续到大众所看不见的场域, 把扣留营转换为抗争基地与文化生产场域。其三, 国语运动的推动至少由三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支撑, 这包括了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观、单一民族国家的平等和民族平等原则。最后, 本文将指出, 随着华裔左翼运动的激进化, 民族平等原则发展出以普通话反抗国语的论述。

关键词: 国语运动、左翼、马来亚、冷战、反国语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Malay language movement during Cold War period. The language movement, as a response to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olonies, has started since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Four major points are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modernization of Malay language involve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 their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along the way. Secondly, the movement was deemed as a form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carried out by the leftists, a group of people who had been oppressed. Although majority of them were arrested and detained, they had transformed the detention camp as their field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o continue their struggle. Thirdly,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political ideologies behind th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astly, "Putonghua" was promoted as a counter to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by the Chinese leftists who became more radica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eft wing, Malaya, cold war, anti-national language

一、前言

1948年6月，英殖民颁布紧急法令，左派党团与左翼人士纷纷被查禁与逮捕，许多人逃入森林，与马来亚共产党并肩作战，展开武装抗英运动。部分人则转移阵地，在不同领域，继续反殖民运动。尤其是马来左翼分子，在1950年代成立了不少语言与文学组织，透过语言文化活动，推动反殖民抗争。其中最为瞩目的，是1950年在新加坡创立的五十世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简称五十世代），在多方奔走下，从1952年起，他们与其他马来语文团体一连举办了三届的马来语文大会（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展开独立后马来人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以五十世代为首的马来语文团体，从此成为殖民地政府或之后的联盟政府的压力团体，督促政府制定符合他们理念的语言与教育政策。

约莫此时，英殖民政府开始了整合殖民地境内教育体制的工作。根据一些研究指出，这背后显然与英殖民政府“反共政策”有关。新加坡历史学家孔莉莎这么说：“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形势更加严峻。

随着事件演变，英方不得不重新思考它的教育政策，要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把现存的依不同语言源流运作和政治忠诚迥异的学校体制，重新整合起来。”（孔莉莎2011：29）¹ 马来亚也面对相同的局势，殖民当局陆续推出不同的教育报告、白皮书等，尝试把多源流教育整合为马来语和英语源流，希望透过进一步强化对教育的管制，隔绝中国共产党对殖民地的影响。当时左翼人士对此相当警觉，例如1966年劳工党槟城分部《党讯》刊登的一则文告：“华校和民族学校向来都被认为是左派和进步力量的来源，是培养左派干部和民族爱国心的所在地，因此，英殖民主义者和反动派一路来都千方百计要消灭华校和其他民族学校，妄图断绝和压制反帝爱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以达到其长远统治我国的政治目的。”（李万千编2012：8）正是在此背景下，华人社会在林连玉领导下展开了华教运动，尝试让华文学校纳入国家体制的同时，保存其华教特质，即以华语为教用语、考试语和行政语言。

另一方面，美国也参插一脚，在东南亚部署战略。1957年美国制定《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威信。为达此目的，“美国驻东南亚有关人员还曾直接帮助东南亚华侨了解并认同居住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刘雄、尹新华2006：42）²

综上，国际冷战与1950、60年代的马来亚意识显然有着一定的关联，并对当时掀起的各种语言运动，如学习国语运动、华教运动等，起了一定的影响。透过对语言和教育的管制与干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尝试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以达到反共的目的。

然而，尽管有着上述的国际冷战背景，这并不表示，从1950年代开始，在华社与马来社会掀起的国语运动，是个完全由外部因素主导的语言运动。相反地，它其实是一个长时段的语言运动的结果，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马来半岛的封建社会与移民社会。其次，国语运动基本上是马来亚民族主义的一个部分，而这个民族主义运动最先由左翼运动展开，并以“马来语为国语”的意识形态，对抗“英语至上”的殖民主义。因此，国语运动在某个面向上，有着明确的反殖民主义意识。从冷战格局来

看，就是反抗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马来亚左翼对于殖民地（以及稍后的联盟政府）制定的语言和教育政策，却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左翼运动内部的决裂。另一方面，华裔左翼由于各种因素，包括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意识形态与抗争手段激进化，最终从过去的支持“马来语为国语”，发展出“反国语”的论述。

本文尝试针对上述所梳理的1950、60年代的政治脉络，分析当时在马来亚推动的（反）国语运动，以及其内在所蕴含的思想。

二、马来文与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

踏入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带来了现代科技、政治与经济制度、知识与思想，动摇了马来半岛的封建社会与移民社会。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输入，也因此改变了殖民地的社会文化构造。然而，在当时，马来文与西方现代性产生联系，却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一种是以罗马字母书写的峇峇马来文，基本上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语言。另一种则是尝试捍卫爪夷文的高等马来语，与峇峇马来文相对，这是一种强调规范化的语言。两者都对1950、60年代的国语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

马来语文在很早以前已经成为马来世界（*Alam Melayu*）³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一种运用于商贸、参杂各不同语言、自然生成的混杂语，基本上是一种市场语言（*bahasa pasar*）、皮钦马来语（*Melayu pijin*）或低等马来语（*bahasa Melayu rendah*），这与内陆马来人之间使用的、更少受外来语影响的高等马来语（*bahasa Melayu tinggi*）形成鲜明对比。皮钦马来语起初只是市集上的语言，不是家庭用语，但是该语言后来成为峇峇家庭内代代相传的语言。（*Asmah haji Omar 2013*）

峇峇马来语大概在19世纪成为书面语，峇峇华人不使用当时马来社会通用的爪夷文（*tulisan Jawi*），后者是一种改良自阿拉伯字母的书写文字，在马来世界伊斯兰化后逐渐取代原本的跋罗婆文字（*tulisan Pallava*）。峇峇华人使用从西方传教士学来的罗马字母拼写马来文。然而，追溯历

史，最早把马来语文罗马字母化的人，其实是16世纪意大利人皮加费达（Antonio Pigafetta），当时他随着麦哲伦来到马来群岛，以罗马字母拼写的方式采集当地语言，编了一部意大利——马来语雏形词典。（Asmah haji Omar 2013; Ismail Hussein 1966）往后数百年，西方人陆续编撰了多部字典、词典，在双方语言文化上建立了更深层的交流。然而，这样的文化交流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各西方殖民势力轮流瓜分马来世界，因此是西方殖民史中东方学知识传统的一部分。峇峇华人能够透过罗马字母书写马来文，正是此大脉络下的结果。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于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峇峇华人开始有系统地学习西方知识，包括罗马字母。1890年代，峇峇华人开始涉足马来文报业，首创罗马字母化的马来文报刊*Surat Khabar Peranakan* (1894)，以后又陆续出版各种报刊杂志。峇峇华人除了涉足报业，也出版大量的文学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峇峇文学创作等。有论者认为，峇峇社群在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输入下，透过“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创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庄华兴2008）

就在峇峇社群积极地推动文化身份的建构之际，马来半岛多个小王国纷纷落入英殖民手中。抵抗被殖民地化的办法就是自强。19世纪末，柔佛苏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为回应英殖民主义的侵略，开始推动现代化运动，以保住自己的政权。阿布巴卡为此频繁拜访欧洲诸国，希望与彼等建立平等地位的邦交关系。另一方面，柔佛也展开司法、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例如，采用了模仿西方的“柔佛政府文职制度”、创设马来半岛第一个宪章、发明“港主制度”积累资本等等。

（Malik Munip 1989）语言文化方面，柔佛创立第一个马来语文现代组织——语言知识教学联盟（Pakatan Belajar Mengajar Pengetahuan Bahasa，下简称“语盟”）。语盟早期的主要参与者来自柔佛的行政精英，其成立目的是为了在成员之间提倡学习与写作的风气，透过这个方式，提高个人的行政能力之余，也希望促使马来语文现代化，进行新词创造、文化翻译等等。（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1989）

语盟设有六项目标：（一）维护、完善化与现代化马来语文，以及

维护爪夷文书写系统；（二）统一拼写法与词汇；（三）创造新词汇；（四）举办座谈会与推动研究，以便普及化知识；（五）出版*Peredar*期刊；（六）创办图书馆。（Haji Jumaat 1989: 2-3）姑且不管是否达成，这六个目标至少表明语盟有着明确的“语言管理”的意识，尝试透过各种主动的方式促进马来语文的现代化，例如进行语言标准化或规范化、有意识地创造新词汇等等，而且为了使知识积累进一步建制化，设定了出版刊物与创办图书馆的目标。另一方面，语盟也格外重视语言的政治性，把马来语文视作主权的象征，如强调柔佛的官方事务都必须以马来语文进行。

（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1989: 13）

以上，峇峇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柔佛的马来语文现代化，大致发生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首先，峇峇文化身份的建构源自于社会领域，透过峇峇社群本身，加上经济领域的配合，形成了自19世纪末开始的峇峇马来语文活动的盛况。反之，柔佛的马来语文现代化，则是由国家启动，牵涉的主要是掌握行政权力的管理精英。

其次，峇峇社群已经采用罗马字母拼写马来文，而语盟则坚持、并誓言维护爪夷文传统。在这方面，双方是对立的。

最后，峇峇社群显然缺乏明确的语言管理意识，以致其语言高度混杂、缺乏精致化与规范化；换另一种说法，峇峇马来文是一种自然生成、拒绝外力干预的语言。而这样的情况，似乎不具普遍性，因为在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马来语，则是朝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精致化、雅语化和规范化。（黄慧敏2004：161）相比之下，语盟则有更明确的语言管理意识。这种语言管理意识显然是与峇峇华人非规范化的语文相互对立的。换言之，前者的目的在于避免自己成为峇峇式的混杂语。

然而，为何同样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影响，峇峇华人却未有如柔佛马来行政官员般，产生明确的语言管理意识？这问题非本文所能回答⁴，前文所述，乃在说明，尽管峇峇社群与柔佛王国都在19世纪末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影响，然而彼此在语言理念方面，很显然地，不止是有差异，根本上是相互对立的。无论如何，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

语言实践的态度，并在往后随着碰到各种不同的政治格局，或断裂或延续。

踏入20世纪初，尽管已经出尽各种办法，柔佛依然无力回天，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紧接着，马来语文地位江河日下，在好几个重要政府领域，皆由英语取代，司法界便是例子。另一方面，峇峇社群则出现英语转向，峇峇文学最终在20世纪初中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1920、3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崛起，原本已经停止运作的语盟死灰复燃。另一方面，首个马来政治组织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成立了，该政治组织主要成员如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coob）毕业自1920年代殖民地政府创办的苏丹依德里斯师范学院，该校学生接受印尼传播过来的政治文化思潮影响，倡导建立包括印尼在内的大巫来由（Melayu Raya）民族国家。同时，1928年10月间，来自印尼群岛各地的一批年轻人在雅加达发表《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支持“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个语言”，并选择了马来语（印尼语）为其团结语言。这样的政治观念深刻的影响了这批马来左翼民族主义者。

然而由于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来自草根的马来人仍无法在政治舞台上太大的发挥空间，这让语言与文化领域成为介入社会的一个缺口，当时马来社会成立了许多相关的团体。（Rustam A.Sani 1989）其中值得留意的，是马来亚笔友会（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Malaya）。这个组织以檳城为起点，并扩展至全马来半岛，甚至包括沙巴、砂拉越等，最终建立了跨州属的马来人认同。其宗旨除了联系笔友、鼓励马来语文阅读与创作风气，也透过其所成立的语文理事会（lembaga bahasa），尝试在会员之间推动语言规范化工作。（Haji Jumaat 1989: 5）就这一点而言，仿佛看到了从语盟延续下来的火苗，区别仅在于，语盟发生在国家领域，而马来亚笔友会则是马来半岛被殖民后，发生在马来社会领域的文化活动。借用依斯迈胡先（Ismail Hussein）的观点，这背后其实正是马来社会在语言与文学方面去封建化过程，即语言文化的中心从“宫廷”转向“民间”。（转自Rustam A.Sani 1989）就这点而言，马来亚笔友会与峇峇文化共享了某种属

于民间的特质，尽管这当中并没有经验上的连续性。

相比之下，二战之后，马来亚的马来语文运动，主要还是与语盟有着更直接的理念上的连续性，而非峇峇马来文。尽管峇峇华人率先把罗马字母引入马来报业，而马来亚在1950年代独立建国期间，也确实最终选择了罗马字母，而非爪夷文，作为国定的书写字体。然而，峇峇马来文对彼时的国语运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根据马来学者，20世纪初期，峇峇社群之外的马来人，其实并没有采用峇峇马来文的非规范性的拼写法，而主要采用威金生（R.J. Wilkinson）或哲伯（Za'ba）在20世纪初期个别创建的拼写法。（Asmah haji Omar 2013）然而，另一方面，根据梅井的统计，现代马来文中参杂了大量的中文词汇，显然是峇峇马来文对马来文的影响所致。（Mei Jing 1963）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1950年代的国语运动，其最重要的特质还是延续了语盟的“语言管理意识”，就这一点而言，峇峇马来文作为非规范化的语言，成为了前者的规范对象。

国语运动从语盟继承了语言管理意识，马来语文分别在“语言建设”和“语言政治”两方面开展现代化。所谓语言建设，指的是现代化马来文的词库，并规范化其拼写法、语法与发音等，以使马来文与现代知识接轨的同时，也使之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沟通工具。另一方面，语言政治则是指一个政治实体对其境内不同语言进行地位规划，这种规划不仅牵涉到各语言在不同领域的用途，也牵涉到资源再分配、认同建构等。例如，规定何种语言是国语。马来语文在面对独立建国的情境时，正是针对上述两个范围展开建设工作。

三、左翼国语运动：从共识到分裂

如前所述，1948年紧急状态之后，左翼运动遭遇重挫。马来左翼分子纷纷从政治领域的斗争，转向语言、文学领域。1950年，五十世代在新加坡成立，在该文学组织的努力下，分别在1952、1954和1956年举办了马来语文大会，透过此活动推动其政治理念，却遭到本土派如马来语文理事会

（Lembaga Bahasa Melayu）的挑战，后者主要是由教师组成的团体。五十世代希望追随印尼步伐，主张印尼化的马来文，包括句式、发音、罗马字母等，反之马来语文理事会则主张本土化的马来语、爪夷文字等。从某个方面看，五十世代的主张，是马来左翼在政治幻灭后，转向文学与文化上与印尼大一统的理念重生。（Syed Hussin Ali 1959）而这方面的竞争，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的方式结束：罗马字母为正式书写文字，与此同时不废除爪夷文字。

三届马来语文大会后，立马来语为国语，已成为各方共识。而马来亚华社正是在此时参与国语运动。其中以第三届马来语文大会最具象征意义。根据杨贵谊的个人回忆，第三届大会获得一部分华裔文教界人士参与，其中包括中正中学的庄竹林校长、上海书局经理包思井、马大生陈蒙鹤、南大生林焕文、杨贵谊、吴诸庆等。华社对此大会极为关注，会议期间有43个新加坡华族文教团体，在福建会馆大礼堂为大会的150位参与者举行盛大庆祝会，报刊亦对此作出详细报导与评述。（杨贵谊2014：334）

马来亚华社在1950年代掀起学习国语的热潮，位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是整个运动的中心。当时的南大生热烈响应独立建国的呼吁，在大学初创期间就表现出学习马来语的浓厚兴趣。例如，在校方还未来得及把马来文列入正式课程前，1956年3月至1958年2月，学生会筹委会就迫不及待自行开办马来文夜校班，邀请通晓马来语的同学担任老师。尤其重要的是，南大生不仅表现出学习的热衷，还投身到马来语言文化的研究与生产，例如杨贵谊、廖裕芳、廖建裕等人，往后均在马来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庄华兴2004；2008）

除了南洋大学，当时华社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地配合国语运动。许多报刊都设有学习国语的园地，如《星洲日报·国语学习》、《南洋商报·国语周刊》等，同时也有大量的有关马来语文与文化的书籍出版。（杨贵谊2014）此外，华人会馆也不落后。槟城番禺会馆在1958年成立国语委员会，开办国语课程、举办马来语文化活动等。（Kwok Yim Weng 1960）

在学校、会馆、出版业之外，当时的左翼政党也积极响应，如由马来亚劳工党（Parti Buruh Malaya）和人民党（Parti Rakyat Malaya）组成的马

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 Rakyat Malaya）⁵，就相当积极响应学习国语运动。《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就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社阵一开始便支持马来语为国语，它与泛回同一态度，都不断责怪联盟政府在发展国语方面虚张声势，并无实质贡献。因此，它不但全力支持国语周、国语月运动，也从《火焰报》第4期开始，特辟半版《国语专栏》，以活学活用的方式，利用党内文件作为教材，教导党员“学习国语、应用国语”。社阵不但诚心诚意的支持国语，而且把学习国语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取得显著的成绩。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184；粗体为引者强调）

把学习国语当作政治任务，与当时冷战格局有关，马来语成为一种抗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点下文会再谈到。除了开辟学习国语专栏，社阵也开办文化课，设立华语班和国语班，“后者的**普遍设立**，足以显示社阵人、劳两党对马来语文的重视。”而所谓普遍设立，主要是在市区的支部，因为市区比较容易找到马来语人才。（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04-205；粗体为引者强调）社阵对国语运动的积极响应，也表现在文化表演方面。例如1961年10月12日，劳工党槟州双溪槟榔支部在客属公会，举办成立6周年暨慰劳竞选工作人员的游艺晚会，其中就包括了笑剧《加紧学习国语》。（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09）其他包括在社阵的《火焰报》和劳工党的《劳工报》刊登马来文学翻译，如东革华兰的《不要问》、《英雄与祖国》、马苏里的《为了祖国的荣光》、乌斯曼依斯迈的《我们战斗了》等。（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211）

左翼政党，无论是人民党或劳工党，基本上都把国语运动视作反殖民抗争的一部分。即便是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由于左翼坚持不承认那是真正的独立，因此1957年之后的国语运动，仍然被左翼视为是反帝、反殖的运动，而不是国家独立之后的去殖民化运动。社阵在〈马来亚社会主义斗争：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与联盟政府〉一文表示：

在我们的社会里，政治现实正反映在这殖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

其实，殖民地主义势力在反动集团的掩护下，还是根深蒂固的盘踞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领域。在马来亚的经济命脉尚为殖民经济势力所牵制而不能自立发展的现阶段，所谓独立、自主，仅是殖民主义势力范围内极有限的“独立”。

（陈剑虹编2000：141；引述者强调）

社阵认为，联盟政府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傀儡，视之为国内的反动派。而其所制定的语言政策，不过是推崇“英文至上”的烟幕。前引之文随后表示：

谁也知道，所谓改制的“国民型”学校，其实就是变质的奴化教育机构。承继殖民主义反动教育政策的联盟政府，虽然高唱“扶助与发展巫文教育”为名义，实际上作为官方语文之一的巫文只是发展英文教育的一种烟幕，我们却看到奴化教育的英文日益抬头，且已由一种侵略语文变为马来亚的主要官方语文。这一切的事实显示出联盟政府的虚伪与反动的嘴脸。

（陈剑虹编2000：143）

在此，我们看见了冷战与语言之间的关联，以及左翼在语言理念上的共识。对于左翼政党而言，联盟所执行的语言政策，乃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意志，所推行的是奴化教育，所推崇的是英语至上，所维护的是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本邦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反帝、反殖，必然就意味着反对英语至上。

然而，反对英语至上却可以指向两个不同的语言政治愿景。这两个愿景，源自两种不同的语言理念，而这最终导致左翼阵营内部的分裂。对人民党，尤其是马来党员而言，反对英语至上，是因为英语至上压抑马来语作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发展。然而，对劳工党，特别是华裔党员而言，反对英语至上，是因为英语至上压抑各民族语言，这包括了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的发展。这样的差异，导致了马来左翼分子，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治要求，而华人左翼分子（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虽然仍然支持马来语为国语，却反对唯一官方语文政策，

争取华、印（即淡米尔语）文同为官方语言的要求。⁶

显然，这当中有着一种认知上的差异，最终推导出双方在语言理念上的分歧。关于这一点，会在下一节详论。在此想要补充几点。首先，社阵后来在1965、66年，因为各种因素，其中包括语言理念的分歧而分裂。1965年7月22日，马六甲市议会会议上，劳工党两名市议员公开支持列华、印语文为议会语文，人民党马六甲分部因此提出警告：“为了维护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文的权益，将毫不犹豫地和劳工党分裂；人党州分部也发出谴责和恫言退出社阵的文告。”（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337-338）此事件随后持续延烧到各州，最终在1966年1月10日，劳工党全国主席林建寿在总部召开记者会，宣布从16日起，人民党与劳工党正式分裂，社阵宣告瓦解。（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340）

其次，劳工党的语言政策不是一以贯之的，它曾经历过大幅度的转变。劳工党于1951年创党，初期党内都是“反共亲英”派，在反殖民方面毫无作为。1953年，一批费边社会主义者加入劳工党后，情况才改变，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然而，在此阶段，劳工党基本上支持单一国语与官方语言政策。一直到1965年左右，劳工党内部掀起反右运动，把英文教育背景的党员挤出领导层，华文教育背景的党员上位，提出结合董教总的民族文化斗争路线，发动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绪言）李万千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也表示：

当时劳工党及社阵的语文政策主要还是由党内受英文教育的精英所主导，他们一般上支持以马来语作为国语与唯一官方语文作为建构国族的愿景，忽略了各族人民应享有的语言人权和教育平等权，在客观上怂恿了联盟政权实行种族主义的单一语文同化政策。这偏差一直到1966年才基本上获得纠正。

（李万千编2012：III-IV）

以上所见，劳工党从支持“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的立场，转向“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这种立场的转变，背后当然与因为党内的权力转移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来自不同背景的掌权人，之

所以改变立场，基本上并不是因为外部局势而做出的策略决定，而是因为他们所拥护的价值观所致，即他们真诚地想要捍卫华语文的地位。

至于人民党，由始至终，基本上一以贯之地坚持“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立场。例如，1967年4月，人民党领袖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astamam）出狱后再次担任党主席，曾经提出组织反对党联合阵线9项最低纲领，其中第五项：“废除殖民地主义的教育制度，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651）

关于左翼国语运动，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补充。1950、60年代，为了打击左翼运动，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政府，大势逮捕左翼政党领袖与党员。许多人在内安法令下成为政治犯，在扣留营中度过漫长岁月。政治打压的目的乃是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利，使之失去行使政治意志与社会影响力的机会，换言之，是对个体解去政治化。而扣留营就是一个以执政者的权力意志遮蔽的“私”领域⁷。然而，当时左翼分子在扣留营中，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命运。相反地，他们从原本以带有消极、慰藉的“难友”自居，于1967年底开始，随着劳工党斗争在意识形态与手段的激进化，改为称呼彼此为“战友”，原因是：“大家立意将扣留者当作一个作战的场所”（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594）也是从那时起，扣留营成为了“战场”，权力意志所欲“私”化的空间与“去政治化”的个体，于是随着抗争的掀起，重新公共化与政治化。

扣留者当时为了争取更良好的生活环境、人权、自由等，组织了扣留者联合委员会，并多次发动绝食斗争。除此之外，当时营外的“反右斗争”也蔓延到营内来，扣留营于是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值得注意的是，扣留营除了作为政治化的战场，同时也成为文化生产场域。在当时，人们可以透过营方安排学习国语，学有专精的扣留者，甚至在狱中创作、翻译。

例如，曾荣盛诗集《释放》（Pembebasan），此书于2015年出版，收录60余首过去在扣留营创作的诗歌，其中提到，他之所以在狱中创作马来诗歌，一方面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学习马来文，另一方面，学习、使用马来文，乃是出自一种自觉：“我相信掌握马来语有助于团结/我明白在多种

族社会中马来语的重要性”（Chan Yong Sin 2014: II; 笔者自译）而且，由于身在狱中，所以写诗也多了另一层的意义：“我写诗/是为了记录狱中的生活、苦难、友谊与抗争/我写诗/是为了鼓励深陷囹圄的自己挺直腰杆/我写诗”（Chan Yong Sin 2014: II; 笔者自译）

以上所指的，乃是由于冷战的“反共”，许多左倾知识分子遭逮捕入狱，扣留营在此特殊时代背景下，变成了一个政治抗争场域以及文化生产场域。就后者而言，其中许多有关华巫文化生产的著作，都是左翼马来文或国语运动下的产物。

四、三种不同的社会正义观

1950、60年代的国语运动，是个多方参与的运动。首先，尽管国语运动的发生背景是国际冷战，英美在这方面显然有一定影响力，但国语运动的发生，如前所述，源头来自于19世纪末以来的峇峇马来文、语盟与东方主义传统等等，是一个长时段的语言现象。其次，国语运动并非单方面透过政府从上而下推动的政策，而是国家、资本与社会三方的合作、竞争的运动。最后，所谓的社会，并不局限于马来社会，还包括其他族群，特别是华社。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单一的，涉及左右不同的政治光谱。

承上，我们不免问一个问题：所谓的国语运动，既有自19世纪末以来的长时段发展脉络，又有当时的外部干预因素，同时又是一个多元意识形态竞争的现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国语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既然这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则其背后是否涉及什么社会正义观？

下文尝试回答上述的提问。我认为，1950、60年代的国语运动，至少牵涉到三种不同的社会正义观。第一种，可称作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严格说这是一种反平等的价值观。第二种是民族平等原则。最后，是透过印尼二手引进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平等。这三种社会正义观，不必然与国族构建有直接的关系。这点是相当吊诡的。因为，一般的认知，国语运动就是透过国定的语言把各个不同的个体与群体想象成共同体。关于这个吊诡情

况，下文会进一步分析。

许德发在探讨马来（西）亚华巫两族的“平等”和“公正”论述时，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公义观，并认为这两者都是从各自种族利益角度出发的。（许德发2015：164）他指出华人社会追求的是“道德平等”：

华人社会的平等要求涵盖各个方面，包括了文化平等、教育平等，经济上的商业机会平等以及政治上的平等公民身份。……从西方政治学来看，华人的平等意识其实是一种道德平等。它强调的是“泛”平等主义的陈述，意指政治身分上或公民身分的全面机会平等（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平等，如经济机会平等、就读大学机会平等、公务员就业机会平等、奖学金平等）……⁸

（许德发2015：165-166）

另一方面，许氏非常敏锐地发现，马来民族主义者后期逐渐倾向于驳斥平等概念，而追求公平。他举例说明，马来西亚柔佛州务大臣莫哈末卡立提到，国阵是“公平”（kesaksamaan）地对待各族，而非“平等”（kesamarataan）。许氏批评道：“这就是典型的‘民族至上’下的‘伪公正论述’，认为平等只能在族群内讲，而非与他族之间。这种差异对待完全从族群角度出发，完全违背了道德平等所注重的‘不可因其性别、年龄、学历、出身、智商、种族或其他个人归属因素而遭受歧视’原则。”（许德发2015：171）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许德发的归纳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上述华社的“道德平等”大略可等同于本文的“民族平等原则”，但必须略作修改，因为后者并非只谈机会平等，也不反对扶弱。而“民族至上的伪公正”则可等同于“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然而，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许氏文中分别对华社与马来社会各打五十大板，批评前者强调平等却忽略公正；后者反对平等，而其所强调的公正又是个伪公正。这样的区分，还不足够。本文从国语运动脉络看，认为至少还有第三种社会正义观：单一民族国家的平等。

所谓的“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指的其实是“1957年体制”的问

题，它涵盖了联盟主导下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主要妥协，这个“独立妥协”在往后被官方称作“社会契约”。（黄进发2015：136）社会契约，指的是在宪法权利交易的三个配套：一、透过向非马来人放宽公民权条件，换取马来人在宪法第153条获得特别地位；二、承认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但宪法列明保障非穆斯林的宗教自由；三、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但宪法保障非官方用途上其他语言的使用与学习权利。（黄进发2015：136-137）黄进发把这形容为“差异性公民权待遇与慢性同化政策”：

它一方面以特惠待遇与慢性同化的结构性机制来安抚害怕失势的马来人，满足他们对移民被同化的文化期待；另一方面则以包含经济自由的公民权、以及宗教自由与语文自由短中期不变的保障来满足非马来人的要求。

（黄进发2015：138）

黄氏关于差异性公民权待遇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慢性同化却值得再斟酌。与其说联盟政府的政策是“慢性同化”不如说是“选择性同化”。当中的道理是，创造差异是族群政治的游戏基本盘，一旦所有人被“同化”，无论是短期或长期的事，都意味着差异被消除，能够被操弄的他者也就消失了，族群政治无法持续下去。⁹因此，这份社会契约，更确切地说，是“差异性公民权待遇与选择性同化政策”。

黄进发认为，1946年时主流马来人对国族建构的想象，是一个“纯马来人的国家”，到了1957年，因政治格局使然，国族构想改变为“以马来人主导的国家”，而产生了上述的社会契约。（黄进发2015：138）这样的社会契约，基本上把上述的马来人特别地位、马来语和伊斯兰教，视作“马来人支配权”的象征。按此情况，对认同这套论述的人来说，推广国语，并非对其他公民进行文化同质化的手段，以便给予被同化者以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换言之，这并非一般国族主义所强调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尽管他们很常挂在口里。相反地，推广国语，是作为宣扬、确认马来人支配权的手段，以此巩固自身的“主人”地位，通过这样的方式，正当化政治与经济权利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基于

社会契约是自愿的，因此被认为是公平的。公民在政治经济权利的差异对待，不可能催生共同体意识，故此也就跟国族建构没有任何正向关系。¹⁰

这份“社会契约”值得与林连玉的〈为《马来前锋报》开斋节特刊而作〉作比较。该文是林氏在1956年开斋节的献辞，原文发表在爪夷文报刊《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因此，读者对象毫无疑问是马来人。该文首先提到培养共存共荣观念的重要性，指出在这民族复杂的马来亚，“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然后提出第二点：“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林连玉1956：214；引述者强调）

在林氏的这篇文中，华巫印等其他族群，是被当作“民族”看待，因此享有平等的民族权利。而林氏所提的第二点，似乎是作为第一点（民族平等原则）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这也是一种社会契约：透过认同马来亚为新家园，因此承担若干义务，来换取民族平等的权利。

林氏的“民族平等原则”，显然与前述“社会契约”相违背。¹¹ 后一个版本的社会契约之所以被视为“公平”，因为这是基于双方（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同意下的权利与权利的交换，前者以公民权、非穆斯林宗教自由与非马来语在官方用途外的自由使用，与后者交换承认马来人特别地位、伊斯兰为联邦宗教和马来语为国语。这样的交换导致公民权利的差异对待，但依然被认为是“公平”，因为这是取得交换双方同意的。相反地，林氏的民族平等原则，则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从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利都必须是平等的。换言之，这其实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权利的诉求。¹²

民族平等原则非林连玉独有，而是当时主流华社所认同的一套政治论述，这包括了华人左翼分子。华社之所以会有此观点，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家独立前，已然透过中国政治现代化完成“民族”身分的建构有关。而华人左翼分子，则进一步受到中国左翼思潮影响，接纳了“民族自决”的观点，他们强调马来亚是个多元民族国家，各民族语言、文化、政治与经济权利长期以来遭受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动派的压迫，因此反殖民抗争的目的，乃在于解除“殖民者——被殖民者”支配结构，让每一

个民族与个体恢复到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语言、文化、政治与经济权利。与此同时，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作为跨族群的共通语。进一步说，如果反英文至上是反殖民的一部分，那么反殖民成功之后，所还原的，是各民族语言地位的平等。这就是华人左翼秉持的语言理念，例如〈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提到：

我们认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不仅仅是保卫民族教育的问题，同时也是争取民族平等地位的重大问题。因此，争取民族教育平等是与保卫华文教育的斗争，是与争取民族平等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是一场正义的斗争。

（李万千编2012：3）

以上梳理了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与民族平等原则，下来分析推广国语的第三种社会正义观，这种思想来自于印尼，深刻地影响了马来左翼分子，我称作“单一国族国家的平等”。其基本原理是，政治经济权利必须与文化认同挂钩。透过单一语言，创造公共文化，促进公民的凝聚力，维持国家的动力。公民透过单一公共语言形成的认同，也使得平等分配政治经济权利给所有公民成为可能。

人民党的“平民主义”（Marhaenism）¹³最能说明这种思想。它的来源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卡诺（Sukarno）。Marhaen是苏卡诺在1920年代遇见的一名农民的名字。平民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与共产主义有一定亲和性，两者同样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大任，但在三个方面有区别。首先，在抗争手法上，共产主义主张革命，而平民主义认为，除了革命之外，不排除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必须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再作决定。除了手段的差异，在抗争主体上，双方也有些不同。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为主，而平民主义则是全体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渔民、知识分子、小商人以及其他阶级的人。“‘平民主义’并不反对以工人阶级为战斗先锋的看法。不过它与共产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它需要配合历史和环境的需要，并与其他拥有相当力量的各阶层人民合作。”（阿末布斯达曼1960：11）平民主义与共

产主义第三点区别是价值观：

共产主义是为着无产阶级专制而斗争。“平民主义”则不然，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平民主义”是信仰民主的，但是民主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另一种是合作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

“平民主义”信仰合作的民主，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平民主义”的民主的最后决定权是真正由人民来决定的，人民在决定时是不受个人、金钱或其他物质影响的。人民就是在这种方式下组织自己的国家，最后才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领导这个国家朝向公平和繁荣的社会迈进。

（阿末布斯达曼1960：12；引述者强调）

平民主义所推崇的是社会赋权，社会基础来自人民，因此，关键是，文中所提的“人民”是谁？过去阿末布斯达曼曾以“社会-民族-民主”来概括该党的政治理想，显然文中的全体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所指的就是“国族”。一旦国族身份得以构建，全体人民享有政治经济权利的平等。然而，这样的国族如何构建？

我到现在还是坚持马来语是本国的唯一官方语文和国语。我们也坚持本国不应采用多种语言制度。可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是不欲消灭存在本国内的其他语文，特别是本国非马来人的母语。

（阿末布斯达曼1960：25-26）

马来语作为国语和唯一官方语文，指的是该语言垄断一切与官方用途以及在公共领域（尤其是跨族群的）方面的使用权。其他语言，按照宪法，依然得到保护、学习，但那主要是保留在私领域的运用。然而，这也意味着否定其他族群享有作为一个民族所应享有的权利：拥有自己的社会性文化机制、一套公共语言等。

五、反国语论述

华人左翼（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向来认同“民族平等原则”，然而一直以来他们所参与的左翼政党，特别是劳工党，在语文教育课题上，并没有以争取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为重要斗争目标。另一方面，从1952年开始，华教运动就展开了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的运动。（Tan Yao Sua 2010）当时的华教人士意识到，华文教育在国家化过程中之所以危机重重，根本原因在于华语不是官方语文。

如前所述，劳工党直至1966年，随着反右运动把英文教育背景的领导拉下马后，华文教育背景的领导才能上位，并正式展开“争取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以及反对1967年的国语法案的运动。1966年10月24日，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英殖民主义者勾结联盟政府所实行的奴化和消灭华文教育的反动政策，并且，誓言：我们一定要把争取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的斗争与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以及董、教、学争取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共同奋斗，并向全马党员及群众支持者提出呼吁：坚决支持与展开一切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斗争！

（李万千编2012：1）

然而，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却遭到雪州人民党批评。此后又遭到新加坡社阵等其他左派团体的批评，并因此引发1966年和1967年之间一场漫长的论争。本文无意在此梳理整个论争的来龙去脉¹⁴，而是想要指出，华人左翼在这场论争过程中，发展出反国语、反官方语言的论述。而这种论述，所反对的不是马来语；他们反对的，是国语政策或官方语言政策，并进一步地，反对国语和官方语言这个概念本身。这种论述的思想资源，基本上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与苏联的左翼思想。换句话说，在面对冷战格局时，马来亚华人左翼挪用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资源，来回应1960年代的语言政治问题。

一开始，劳工党提出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他们所根据的是“民族平等原则”：华人、印度人都应享有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的平等权利。而当时华教在国家化过程中，碰到多番阻碍，可能保不住其本质（华语为教用语、考试语等），这也意味着华人的民族语言和教育遭到压迫。因此，华人左翼乃决议与其他势力，如教总、董总等，共同斗争。如前所述，这种斗争被视为是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联盟政府）的斗争的一部分。在〈保卫各民族语文教育；坚决反对“国语法案”〉一文中提到：

“国语法案”是拉曼政权反动语文政策的集中表现……只是把十年来使用英巫两种“官方语文”的事实“合法化”起来，“国语”的“官方”应用，并不妨碍英文原来的“至上”和“特殊”地位。

“国语法案”否定华印民族语文应有的使用地位。

（李万千编2012：4）

以上引文，是针对即将在国会辩论的《1967年国语法案》，但此时并未提到否定官方语文和国语的概念，而仅仅不同意联盟政府的“英语至上”语言政策，以及打压其他民族语言与教育。因此，这是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行动。然而，由于随后引爆的论争，华人左翼在论辩过程中逐渐明确地表达出，他们从社会主义理念“民族平等原则”进一步推论出来的语言理念。这种理念，质疑国语和官方语言概念的正当性。为行文方便，下文统称为反国语论述。

反国语论述主要援引中国和苏联左翼思想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针对语言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华人左翼挪用了斯大林的“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来探讨马来亚语言政治问题，从而得出反国语论述的反英美意识形态。另一个则是借助瞿秋白的“普通话”概念来反对“国语”。以下分述之。

“语言是否有阶级性”这一问题，不是此次论争的焦点，但却出现一

个转变的轨迹：从认为语言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改为认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样的转变，也许透漏了某些讯息，说明华人左翼在挪用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时，基于在地的需求，而做出策略性的改变。这一点，在讨论到华人左翼选择性挪用瞿秋白的论述时，更为明显。

1966年12月18日，雪州人民党分部发表〈对“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口号问题草案〉，提到：“语言教育问题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在有阶级之分的社会出现以后，由于剥削与压迫阶级为了要实现其梦想永远统治和奴役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因此，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耍弄语文教育问题。”（李万千编2012：23）人民党在另一篇文章又提到：“统治阶级为了要永远统治被压迫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要在各民族之间制造人为的藩篱使到各民族的被压迫同胞不能团结起来推翻他们的血腥统治，而语文问题正是压迫阶级最好利用而且是最有效的工具。”（李万千编2012：30）

然而，很快地，语言的阶级性被否定了。1967年3月5日，星洲社阵发表〈所有语文都平等，都是所谓“官方语文”〉提到：

作为社会交际和思想交流的媒介，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同样的为同一民族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服务。

然而，在殖民地，一个民族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民族，压迫民族，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企图通过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反动文化、文艺强加于被压迫民族。

（李万千编2012：75）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语言是没有阶级的，思想资源很显然来自斯大林。1950年，斯大林透过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语言并非上层建筑的命题。（斯大林1950）其次，透过借助斯大林的理论，排除了语文斗争中的阶级成分，顺利地为其把语言斗争定位为民族民主斗争铺路。而后一点，也为他们选择性挪用瞿秋白的“普通话”概念做了理论的铺垫。

瞿秋白的“普通话”概念发生自1930年代，当时左翼普遍接纳苏联语言学家尼古拉马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瞿秋白就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语言问题。在探讨中国文学革命时，他提倡第三次革命，认为第一次（梁启超式白话小说）和第二次（五四文学革命）都是不成功的。例如，他在批评五四文学革命时就指出：

第二次文学革命，的确建立了“新的文学”，然而在文腔改革问题上讲，这是不是国语的文学呢？那却还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确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语，然而这种新的言语却不是“国语”——现代的普通话。这种新文学的言语，可以叫做新式白话……却还并不是现代中国文，而是“非驴非马的”一种言语……几乎完全只限于新式智识阶层——欧化的智识阶层。

（瞿秋白1931：147；粗体字为引者强调）

“国语”对瞿秋白而言，包含三种不同的意义：全国的普通话、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和国定的言语。他认为只有在“全国普通话”意义上，他能够接受“国语”这个概念。（瞿秋白1931：169）王东杰在分析瞿秋白的论述时，指出：“普通话的重点在于它不是靠‘强迫指定’，而是自然形成的。”（王东杰2014：161）相对地，作为国定的语言，国语是有一定的强迫性的。

普通话与国语的另一个对立，在于语言的阶级性：

国语和普通话被放入两个对立阶级阵营中，一个属于“官僚”，一个属于无产阶级。尤其启发意义的是，普通话同时还是一个与“‘乡下人’的语言”对立的观念。通过这两个面向的区分，普通话遂脱离国语，步入一个崭新的政治空间，而这又是通过阶级和历史这两个意义层面建构起来的：在阶级意义上，国语和一个整体性的“国民”概念连在一起——工农之区别即使存在，也只具有职业意义，更多时候根本没有被注意到；但对瞿秋白来说，“国民”概念显然不足以凸显更为细致的阶级区别。

（王东杰2014：161）

换言之，国语是市民阶级革命后的产物，看似代表了全体国民，其实不过是代表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依然一无所有。相反地，倡议中的普通话代表了无产阶级。

国语和普通话之间的对立，王东杰认为背后有几个考虑：第一、是两个阶级阵营的对立；第二、左翼文化人反对国语，是为了寻求地方文化的平等；第三、考虑到对民族平等问题的思考。换言之，这乃是左翼文化人全面检讨各种类型社会不平等的理论的结果。

然而，这样的“反国语论述”移植到马来亚后，出现了变化。对语言的平等主义式的探讨，不再是阶级对立的问题，因此华人左翼并不讨论诸如华语内部的阶级性造成的不平等（第一点）；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完全忽略寻求地方文化的平等（第二点）；而是集中火力于第三世界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即对于民族平等问题的思考（第三点）。

华人左翼上述的转变，其实与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中国语言学转变的轨迹相当一致。¹⁵ 1950年代初期，中国引发了标准语的讨论。然而，相比起1930、40年代的左翼文字运动的讨论，“此次讨论甚至有‘倒退’嫌疑”：首先，标准语概念，即被规范化的语言，重新启用；其次，北京话再次被提名作为语音标准；其三，瞿秋白普通话的无产阶级定义没人提了。（王东杰2014：167）然而，这也意味着“普通话”概念与国民党时期的“国语”几乎无异。（王东杰2014：168）

从以上来看，1960年代中期的马来亚左翼的“反国语论述”受到了苏联和中国左翼语言学的影响。其语言平等主义的斗争与探讨，集中于民族之间的平等，而不包括民族内部，无论是阶级差异，或内部地方文化的差异。而这样的强调民族之间的平等，恰恰符合彼等所主张的“民族平等原则”。

下来，且看看华人左翼的“反国语论述”。

1967年2月18日，《电总会讯》创刊号发表〈对当前语文问题的看法〉，指出：

在平等的社会里并没有所谓“国语”、“官方语文”的，有吗，

就是对外关系语，普通语等。所以目前许多人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是错误的，尤其是左翼人士更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正确的来说，这口号应该是争取各民族语文一律平等。

（李万千编2012：58）

在另一篇星加坡社阵密件〈我们对语言问题的态度〉中，则提到：

我们认为在马来亚人民当中，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农民、渔民和小商人，马来语是最通用和最容易接受的语言。因此，我们支持利用马来语作为人民的通用语（普通语）。我们应该使用、鼓励并发展马来语作为通用语（普通语）……任何形式的高压手段都会破坏人民要求团结的愿望。因此，必须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来对待各种问题。

（李万千编2012：83；引者强调）

另一篇由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发表的〈我们对语言问题的几点意见〉，则表现出更激进的想法。他们直言“过去左派承认马来语为‘马来亚的国语’”是一项极其严重的错误。（李万千编2012：113）认为“国语”、“官方语文”概念是殖民地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制造出来，作为他们的统治工具。（李万千编2012：114）他们主张：

1. 必须让各族（包括少数民族）自由、充分、平等的发展和应
用各民族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
2. 反对通过任何途径（例如：宪法的途径或国家所赋予的一切
权力），为任何一种民族语文制造特殊的地位来压制其他
民族语文的生存与发展，因为这样做，在根本上是不符合
社会主义各民族平等的原则。

（李万千编2012：114）

他们进一步提出更激进的观点，反对列马来语为人民通用语、普通语或国家通用语。认为，“我们只承认单一民族的通用语（普通话）而不承

认各民族的‘人民的通用语’”（李万千编2012：116）易言之，反对跨族群的共同的沟通语言。

从以上的爬梳来看，马来亚华人左翼的“反国语论述”与中国左翼1930、40年代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前者基本上主要挪用了关于“民族平等”的思考，对于标准语对语言内部多样性的支配以及语言的阶级性，则基本上不在其关注范围内。

六、结语

王东杰在〈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一文中，很好地梳理了官话、国语和普通话的区别。

官话的“官”本意不是“官僚”或“官府”，而是“市民”的通称。官话实际上类似通用语（lingua franca）概念，一种没有强制性规范的共通语：

传统所谓“官话”，主要通行于官员、士子、商人阶层中，多少具有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作为各地人们通过长期交往“自然”形成的语言，它也无需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

（王东杰2014：158）

而“国语”这个概念，早在中国北朝就有了。根据顾炎武《日知录》，当时国语指的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本族语，如在清代大部分时间，“国语”都是指满语，因此所谓国，是指朝廷而言，而这又与统治者的族群相连接。另一方面，“国语”在近代又有不同的意涵，这是透过日本引进的现代概念，它与“国家”、“国际”、“国民”、“国土”、“主权”等概念有关，是民族国家理论的关键词。故此，近代国语则是指“根植于民族主义的冲动，具有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明确自觉，其区别功能主要在对外一面，至其对内，则意在统一：它所设定的主体是全体国民，而非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在程序上，它经过了相关政府部门正式颁

布，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王东杰2014：158）

至于“普通话”，一般认为在清末年间，随着“国语”概念一同从日本引进，起初与国语是同一个概念。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话被左翼文化人赋予不同的政治意义，跟国语区分开来，并成为打到国语的武器。它所强调的，乃是一种无论是就语言内部或外部而言，都在追求高度平等的语言理念，因此相对于国语的管理、规范化、强制性等，它强调的是自然。

以上从王东杰文中梳理了官话、传统国语、近代国语和普通话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其实可以套入本文谈过的有关马来语的语言理念。

19世纪末期的峇峇马来语可等同“官话”，强调的是由社会自发、自然生成、非规范化。至于柔佛政府推动的马来语现代化，则接近“国语”这个概念，主张语言必须被规范化。然而，随着政治格局的发展，马来民族主义出现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种强调突出“马来人主导的国家”（基于社会契约的公平），以及强调全民共享文化与权利的“马来亚民族主义”（单一国族国家的平等）。前者类似“传统国语”的概念，而后者则是“近代国语”。最后，秉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华人左翼，挪用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资源，来回应冷战时期的语言政治挑战，其所提出的反国语的语言概念，无疑就是“普通话”了。

然而，如前所述，华人左翼的“普通话”所侧重的，是“民族平等”的一面，而忽视或否定了“语言的阶级性”与“地方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样的一种转变，一方面固然是受到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语言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时马来亚语言政治现实的迫切性相关。后者所指的乃是：相对于其他问题，语言在民族方面的平等，严重受到威胁。而这威胁，在华人左翼的诠释中，被认为是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动派的阴谋，意图永固其殖民地身份与保卫其利益。也因此，“普通话”作为抗争武器，所对准的，并非马来语本身，也非仅仅是国语、官方语言这概念本身，而是冷战格局下的英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动派。易言之，这是第三世界反新殖民主义的抗争运动。

注释

- 1 其他相似的观点，可参黄庭康（2008）。
- 2 从1949至1964年期间，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冷战部署的政策演变分析，可参翟韬（2013）。
- 3 马来世界究竟是否真实存在，引起学界的争议。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认为：“虽然Melayu（马来人）的称号在早期的帝国，如室利佛逝时期，还未被采用来指涉这个区域和居住于此的人民，但是这些王朝或帝国属于日后被称为‘马来世界’或Alam Melayu世界的一部分，以及其人民日后被称为‘马来人’的事实确凿。历史上有许多事实与实践早在形容或解释它们的术语或概念被发明之前，就发生的……这个现象可被称为‘知识的滞后’（knowledge lag）或‘概念的滞后’（conceptual lag）……”（2015：37）
- 4 一个初步的想法是，这跟其现代化发生的领域的区别有关。峇峇社群的现代化来自社会与经济领域，而柔佛马来行政官员的现代化则发生在国家领域。相对于社会与经济领域，国家领域显然基于统治的理由，更迫切需要建设效能更大的表达工具。另一点，也可能跟高等马来语和低等马来语的性质区别有关，但这些都无法解释何以同样是克里奥语的印尼华人马来语却走上规范化、精致化。
- 5 劳工党主要以城市华人为主，而人民党则是乡区马来人。两党有默契的分别在工运与农运分工合作。
- 6 两者的区别，大致上可以这么说，马来文精英追求的是“马来文在公共意义上的绝对支配权”，一切有关公共利益的，无论是官方事务或民间的公共舆论领域，都应该由马来语文支配。至于华社，却有几种不同看法，概括而言，包括了：一、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并认为宪法152条款足以保障语言的自由使用、维持社会层面的多语制，比如1960年代的《马来语月刊》的编辑团队；二、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但华语必须列为官方语文之一，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保住多语社会，比如华教运动、左翼华人等。在这当中，双方看待语言的态度可能会有差异。第一个群体同时以马来语与华语为认同对象，反之第二群体中，不排除部分人接纳马来语为国语，不过是一种运动的策略考量。
- 7 扣留者在营内惨遭迫害，除了恶劣的生活条件、精神虐待等，“在扣留营里，扣留者仍然被剥夺集会、行动、言论和通讯自由，甚至连唱歌和游戏都不准，即使在牢房小聚，也要受到惩罚……”（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484）“……超过三个人在房内阅读或谈天不被允许……”（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488）以此遭遇来看，营内的“私”，不仅因为相对于营外的“公”而言，根本上，在它内部本身，就不被允许拥有“公共”空间，扣留者不被允许过公共生活。
- 8 许氏在该文中批评华人的平等观是一种回应自身族群不平等的反应，后者强调“机会平等”，却忽略了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的“相同起跑线”。换言之，缺乏

“扶弱”的论述。（许德发2015：166）然而，华人社会是否就缺乏“扶弱”论述与实践，可以进一步再斟酌。譬如，当华人左翼分子在对抗“英语至上”时，其所不忿的，不仅是华教地位，也不忿巫文教育被当局边缘化。此外，林连玉在1956年发表〈为《马来前锋报》开斋节特刊而作〉时，就曾指出：“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得极不平衡，这是极可遗憾的现象。但我们相信天生人类是生而平等的……只要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公正的，不平衡的现象很容易的可以纠正过来……”（林连玉1956：215）

- 9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皈依伊斯兰的华裔穆斯林，在1980年代左右被注册局规定，必须在身份证上注明自己的家族姓氏，此举的目的是要杜绝透过皈依伊斯兰获取马来人特权的行径。
- 10 举个例子，究竟是否应该把马来语（bahasa Melayu）改为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以凸显其全民性，多年来在马来社会引起不少争议。马来语曾在1969年513事件后的1970年代改称马来西亚语，但在1986年又改回马来语，至2007年又改成马来西亚语。官方更改名称用意是凸显其全民性，但此决定遭部分马来人反对，认为这是牺牲掉马来语是专属马来人的语言的历史意义。换言之，更名被视作典当马来语作为马来人支配象征的行为。读者可浏览这篇博文，作者表达了对命名为马来西亚语的不满。见<http://siasahdaily.blogspot.my/2007/08/bahasa-melayu-ke-bahasa-malaysia.html>。
- 11 在此多补一个例子，以了解左翼人士如何看待马来亚宪法，在一篇署名维平的文章提到：“根据马来亚的宪法，人民一律平等，各民族得以自由应用和发展他们的语言和教育。华、印族既是马来亚民族的一环，华、印语言和教育，也应是马来亚语言和教育的一环……但是，他们还进一步践踏我国的民族平等原则……这就直接违背了马来亚宪法的规定！”（李万千编2012：71）
- 12 潘永杰以加拿大学者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自由的文化主义”（Liberal Culturalism）来概括林连玉的政治立场，这有可取之处。（潘永杰2015）然而，金里卡的少数群体权益其实可分好几种，其中与马来亚局势相关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少数民族权利；另一种则是移民多元文化权利。前者享有的自主权利更大，大体上享有一般民族国家所享有的大部分权利，包括可拥有自己的社会性文化机制，而后者基本上最终必须融入移居国的主流社会。以此来看，马来亚华人应该归为少数民族权利，还是移民权利，还有斟酌余地，见金里卡（2004）。无论如何，华社向来自视为民族，因此以“自由的文化主义”来分析他们的理路，并无不可。
- 13 “平民主义”的译法可能有误导性，因为Marhaenism不只是指平民，也包括了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等。无论如何，为方便起见，本文采用所引之译本的译法。
- 14 关于论争的发展经过，参李万千编（2012）的序文，在此不赘。必须指出的是，这场运动并非仅仅停留在论述层面。例如，在1967年8月26日：“劳党槟州分部

在三个地区发动火炬游行，反对政府实施国语法案。同时，数百名中学生也在另外两处进行类似游行，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要国语法案’、‘华文教育要开花，华校学生要讲话’、‘全马同学团结起来，坚决捍卫民族教育’、‘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反对消灭华文教育’、‘反对英文至上’等。吉隆坡则发生两宗反对国语法案的示威游行。除此之外，劳党各州支部皆奉中央秘书处的指示，在党所悬挂大布条抗议，而柔佛分部更于9月13日在新山召开大集会反对并抗议国语法案的实施。”（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509）

- 15 不管华人左翼是因为受到中国语言学理论影响而转变，还是因为直接从斯大林的著述中获取新知而促成转变，“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无疑为华人左翼消解了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从而能够集中力量解决民族平等（英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的压迫）问题。

参考文献

- 阿都拉曼恩蓬2015。〈构想民族（国家），思想的历史与历史的思想〉。载《思想》（第十期）。台北：人间出版社。页31-52。
- 阿末布斯达曼1960。〈论“平民主义”〉（译者不详）。载《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领袖言论选辑（1957-1965）》（2009）。焦赖：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页3-40。
- 陈剑虹编2000。《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作委员会。
- 黄慧敏2004。《新马峇峇文学的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论文。
- 黄进发2015。〈公民可以差异而平等吗？马来西亚的69年纠结〉。载于《大马华人与族群政治》。台北：联经。页131-150。
- 黄庭康2008。《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李宗义译）。台北：群学。
- 孔莉莎2011。〈1950年代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政治：紧急状态时期身份归属的叙事〉。陈仁贵、陈国相、孔莉莎编。《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页25-45。
- 林连玉1956。〈为《马来前锋报》开斋节特刊而作〉。载郑良树编2003。《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页214-216。
- 李万千编2012。《语文权利与民族团结：劳工党语文斗争口号论争集》。吉隆坡：凤凰友好联谊会出版。
- 刘雄、尹新华2006。〈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3卷第4期）。页39-46。
- 潘永杰2015。〈林连玉的多元文化国族建构方案：从林连玉与梁宇皋的政治分歧谈

- 起)。载陈绿漪等著2015。《林连玉研究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八打灵再也：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联合出版。页87-102。
- 瞿秋白1931。〈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三卷）》（198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137-173。
- 斯大林1950。《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2016年12月8日浏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ia-chinese-stalin-1950.htm>。
- 王东杰2014。〈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载《学术月刊》（第46卷第2期）。页155-170。
- 威尔·金里卡2004。《少数群体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权》（邓红风译）。台北左岸文化。
- 许德发2015。〈分歧的社会正义观？华巫族群的‘平等’、‘公正’论述与权利争夺〉。载于《大马华人与族群政治》。台北：联经。页151-176。
- 杨贵谊2014。《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庄华兴2004。〈南大学人与马来语文发展：廖裕芳和杨贵谊的贡献〉。载入李业霖编2004。《南洋大学史论集》。八打灵再也：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 _____2008。〈马来西亚华裔作家与现代马来语文学〉。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二期，页112-127。
-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2001。《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 翟韬2013。〈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载《美国研究》（第1期）。页117-137。
- Annual Bakhri Harun 2007. Bahasa Melayu ke Bahasa Malaysia? Accessed on 8 Disember 2016. <http://siasahdaily.blogspot.my/2007/08/bahasa-melayu-ke-bahasa-malaysia.html>
- Asmah haji Omar 2013. *Sejarah Ringkas Bahasa Melayu*. Kuala Lumpur: Jabatan Muzium Malaysia.
- Chan Yong Sin 2014. *Bebas: Antologi Sajak Chan Yong Sin*. Petaling Jaya: Gerakbudaya.
- Haji Jumaat 1989. Daripada PBmPB Hingga DBP: Renungan Terhadap Sejarah Perkembangan Organisasi Bahasa dan Sastra Melayu. Dianjurkan oleh Majlis Kebudayaan Negeri Johor: Seminar 100 Tahun Bahasa-Sastra Melayu di Malaysia.
- Ismail Hussein 1966. *Sejarah Pertumbuhan Bahasa Kebangsaan Kit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 Kwok Yim Weng 1960. Pengalaman Sa-orang Penchinta Bahasa Kebangsaan. *Dewan Bahasa* (Februari): pp. 104-108.
- Mei Jing 1963. Pengaliran Antara Bahasa Melayu dan Bahasa Tionghoa. *Dewan Bahasa* (Disember): pp. 536-544.
- Malik Munip 1989. Peranan Johor Membina dan Mempertahankan Image dan Martabat

- Melayu. Dianjurkan oleh Majlis Kebudayaan Negeri Johor: Seminar 100 Tahun Bahasa-Sastera Melayu di Malaysia.
- Mohd. Sarim haji Mustajab 1989. Elit Pentadbir dan Persoalan Bahasa Melayu: Satu Episod dalam Sejarah Negeri Johor. Dianjurkan oleh Majlis Kebudayaan Negeri Johor: Seminar 100 Tahun Bahasa-Sastera Melayu di Malaysia.
- Rustam A. Sani 1989. Badan-badan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Satu Perspektif Sosio-Politik. Dianjurkan oleh Majlis Kebudayaan Negeri Johor: Seminar 100 Tahun Bahasa-Sastera Melayu di Malaysia.
- Syed Hussin Ali 1959. *Pertubuhan2 Bahasa dan Sastera Melayu di Singapura Selepas Perang Dunia II (Khasnya ASAS 50)*. Singapura: Latihan Ilmial untuk Memenuhi Keperluan Kelulusan B.A. (Hon) Jabatan Pengajian Melayu, Universiti Malaya.
- Tan Yao Sua 2010. Chinese Language Movement in Malaysia, 1952-1967: The Nexus of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a Plural Society. *Cenpris WP*, (127/10), retrieved from <http://cenpris.usm.my/index.php/component/phocadownload/category/2-working-paper-series#>